

LIKEYU

TUZU LISHI YU YUYAN WENZI YANJIU WENJI

李克郁 土族历史与语言文字 研究文集

李克郁 著

民族出版社

李克郁
土族历史与语言文字
研究文集

李克郁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克郁土族历史与语言文字研究文集 / 李克郁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8. 6

ISBN 978 - 7 - 105 - 09736 - 4

I. 李… II. 李… III. ①土族—民族历史—中国—文集
②土族语—文集 IV. K283.1 - 53 H23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7832 号

李克郁土族历史与语言文字研究文集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电 话: 010 - 64271909 (编辑室)

010 - 64211734 (发行部)

[http: //www. mzebs. com](http://www.mzecs.com)

印 刷: 迪鑫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460 千字

印 张: 21.5

印 数: 0001 - 1000

定 价: 45.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09736 - 4/K · 1500 (汉 686)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自序

我出生在互助县东山乡下寺尔村一个土族农民家里。从7岁那年起，就在家里照看弟妹，上山放羊，农闲时入学读书，就这样度过了整整6年的时光。我从小喜欢读书，脑子也很灵，虽不懂汉语，但《百家姓》、《三字经》背得滚瓜烂熟。每到晚上，我爬在小小的炕桌上，在豆大的油灯下学习到深夜。后来，随着时光的推移，逐渐学会了汉语日常用语，也会用汉字造句，写短语，尽管错误百出，动宾颠倒，但父母看了非常高兴，以为懂几个字将来不会吃瞎眼亏。

1947年夏，为躲避拔兵父亲送我去国立西宁师范学校补习班学习。在国立西宁师范学校就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我的汉语文水平有了一个长足的进步，为我以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了初步的并且是影响我人生道路的良好基础。

1949年9月5日，人民解放军进驻西宁，受苦受难的青海各族人民得到了解放。有一天，十几位解放军战士来到我们村庄，他们与旧军人全然不同，客气有礼貌，无人之家不进，无礼的话不说，老人不上炕他们也不上炕，老人不端碗他们也不端碗，没有官气，不讲排场，和朴素的农民没有两样，随便地坐在麦草堆上与我们拉家常说笑话。见此情景，原先逃出村子的那些人又纷纷回来了，他们都说：“从来没听说天下还有这样好的军队。”此后，我便与工作队的同志们混在一起，给他们介绍民俗民情，帮他们做些群众工作，后来又参加了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自然成了工作队开展农村工作的有力助手。

1950年10月，互助县城关区的民政助理员祁寿德同志专程来家通知我立即去东山乡乡政府报到，参加乡里的工作，分管乡里的青年工作。1951年1月，互助县召开第一次各族各界代表会议，我以东山乡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会议。大会期间，被选为互助县第一次各族各界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当时我还不足18周岁，为培养我成才，中共互助县委主要领导同志沈岑、向进元派我去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学习。1952年9月28日我们一行6人乘一辆敞篷卡车离宁赴兰。10月1日国庆节，正是天（天水）兰（兰州）铁路通车之日，没有客车，我们乘坐货车到了天水，而后换乘客车直抵北京。回想起来，去北京学习一事，成了我成长过程中由政界转向学术界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

中央民族学院于1952年10月初招收的这批学生与普通班的学生不一样，普通班设有预科班、大学班，而我所在的班叫研究班，学生除青海来的6位青年外，各地来的人都是老革命、老同志，年龄也很大。研究班的任务是到祖国各地参观、听报告、写心得，然后回原单位工作，时间为半年。在当时，我年龄还小，求知欲很旺，很想多学几年，多学些知识。经申请，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共互助县委都同意了我的请求，于是，我很顺利地转入普通班学习。1954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记得1954年末1955年初的一天，预科部主任浩帆同志叫我到他的办公室。他说：“从内蒙古来了几位客人，他们要向你了解些情况。”随之，浩帆主任亲自引我去见从内蒙古来的客人，客人中有清格尔泰先生、那顺巴雅尔先生、祁海田先生，还有一位先生，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此后再也没有见到他。我们互相介绍后，作为语言学家的清格尔泰首先问我：

“用你们的话把自己的民族怎么称呼？”

“蒙古尔（mongghul）”，我回答。

“土族话里‘人’怎么说？”

“孔（kun）。”

“青年一词应该怎么翻译？”

“扎劳（jalau）。”

“那么你就是蒙古尔扎劳（mongghul jalau）了。”在场的各位听了这话都笑了起来。从谈话中不难看出，他们要了解的是土族语言方面的一些情况，故而提出的问题大多是语言方面的问题，诸如“把那张桌子从屋里搬到外面，把这把椅子从这里移到那里。”“用木头盖房子，用石头铺路”等句子用土语如何翻译等等。最后告诉我：“今年6月，由中央民族学院和内蒙古自治区语文工作委员会共同组成一个调查队，将对国内蒙古语族语言进行一次摸底调查，你的家乡也要派工作组去调查，希望你也参加土族语言调查组。”我说：“只要工作需要，本人没有意见。”与此同时，他们给了我一套记音符号，要我背熟写会，用它来拼写自己的语言。对我而言，学习记音符号，拼写本民族语言，这在当时是一件很新鲜的事情，兴趣很浓。在学习记音符号过程中，得到了蒙文研究班的却精扎布、包祥等同志的帮助，没用太长时间，就熟练地掌握了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确定的一套记音符号。这年6月，我们一行6人组成土族语言调查组，对土族语言进行了第一次调查，调查点设在互助县丹麻乡的桦林村。

在桦林村，我们第一次听到了土族群众要求文字的呼声。那些白发老人，把记音符号误认为土族文字，提出了学习使用的要求。调查组也讨论了这个问题，有位同志叫察汗洞，他认为土族语言与蒙古语的差别还没有达到有些语言

的方言差别那么大，土族人可以直接用斯拉夫新蒙文作为自己的文字，调查组的大多数人不同意这个说法，认为土族是个独立民族，其语言在汉藏语言包围的环境下获得了许多新的东西，新的特点，直接学习斯拉夫蒙文不合适，也是行不通的。这恐怕是解放以后第一次极其认真地讨论土族文字问题的情景。

谈到土族文字，还有一些使我终身难忘的事情，在此简略叙说一二。第一件事是：1952年我们到中央民族学院，首先感到我们国家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字的国家，唯独土族有语言而无文字，是一个落后于其他民族的民族。第二件事是：50年代，在北京的各高等院校经常举行联欢会，会上免不了要互相介绍情况，有几次，兄弟院校的同学问我：“你们土族有语言，为什么没有文字？”他们表示很不理解，而我呢？确实也难以回答这个问题，心里真不是滋味！后来，我有幸掌握了记音符号，若有人再提到这类问题，我就毫不犹豫地：“我们土族不仅有自己的语言，而且有自己独立的民族文字。”并且拿记音符号写几句土语给他们看，读给他们听。他们说：“你们的文字还很先进。”听了这赞扬的话，我心里反而更加难受，其原因很简单，记音符号就是记音符号，怎能冒充文字呢？我这样做只是不愿在文字问题上比别人矮上一截！说实在的，一个民族没有文字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1955年，在北京召开全国第一次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会上有个精神令我们异常高兴，那就是要在1956年对我国各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一次普查，在普查的基础上，对那些有独立语言而无文字的民族创制文字，对那些虽有文字但尚不完备的完善其文字。我深深感到土族文字的曙光就在前头，为土族能解决文字问题，比什么都重要。于是，我放弃了当年（1956年）的高考（我所在的那个班里的同学一半进了航空学院，一半进了北医大），参加了全国民族语言调查训练班。1956年6月，我们一行9人*（照那斯图为组长，本人为副组长）赴土族山乡调查语言，调查组受到土族群众的热烈欢迎。红崖子沟、五十、丹麻、东山的土族群众选派他们最信得过的几位老人拿着哈达和青稞酒，翻山越岭来到调查组的营地东沟大庄村。老人们说：“听说共产党毛主席要给我们土族创制文字。我等代表群众专程前来致谢，拜托调查组把土族人民的心意带到北京去。”备受欺压的土族人民觉醒了，他们认识到了文字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性，他们期望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作为一个有文字的民族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看到此情此景，令我狠下一条心：不为土族创制文字，是我最大的失职；非创制出文字不可，这是我的誓言，也是我的抱负。就在这年，我被调入中国科学院，走上了科研的道路。

调查组返回北京后，在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的主持下，笔者与照那斯图同志共同起草了一个斯拉夫式的土文方案。就在这个时候，中苏关系日趋冷却，祖国大地掀起一股大跃进、放卫星之风，少数民族直接过渡已成为一种时髦的理论，于是，土族文字就搁浅了。随之而来的是三年困难岁月和十

年浩劫时期，土族文字再也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过去，开创了未来。就在批“左”反右，正本清源，全面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的大好形势下，1979年在云南省的昆明市召开了全国民族学科八年规划会议。会上我谈了土族人民从50年代初就要求文字的问题，并介绍了这方面的工作情况及打算，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们的赞同和支持，土族文字问题被纳入规划之中。返回青海后，我及时向省委宣传部、省民委、民院党委和中共互助县委的领导同志汇报了这件事，得到了各级领导的支持。中共互助县委在讨论这件事时认为：“为土族创制文字，解决极‘左’路线下未能解决的问题是对过去错误路线的最实际的批判。”并把创制文字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为了尽早完成制定《土文方案》的重任，也为了土族人民尽早见到自己的文字，吾人日夜奋斗，于1979年6月完成了以拉丁字母为字母形式，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的《土族文字方案》。并在1987年的北京专家会议上讨论通过。也就是当前互助土族自治县土族群众中试行的方案。在此，我以十分激动的心情，感谢党和政府为我们土族创制了文字，庆贺土族结束了有语言无文字的历史，祝愿土族人民珍惜自己的文字，学好用好，用文字来武装自己的民族，繁荣文化，发展经济，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道路上展翅高飞。

前面我已经说过，我这个人大半生与语言文字打交道。那么，后来为什么又关心起历史来了呢？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土族（蒙古尔）源流考》一书前言中有一段文字，充分表达了我当时的心情，现摘录于后：

蒙古尔人的祖先们自古以来就劳动繁衍生息在伟大祖国的疆域里，他们以勤劳勇敢，不屈不挠的精神战天斗地，开拓前进。他们具有坚韧不拔，奋发图强和自我牺牲的精神，用自己的创造性劳动，视死如归的英勇斗争谱写了蒙古尔可歌可泣的历史。他们与临近的各民族人民如同兄弟一般和睦相处，在共同开拓青海地区，捍卫西陲山河，在创造祖国的光辉历史与灿烂文化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深深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人口很少，又没有书面语言的这样一个弱小民族，在千百年严峻的历史风云中能够繁衍生息，并保留其固有的民族特征，这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奇迹。蒙古尔人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的文明程度，是与她那朴实大方，开朗豁达，好学上进和不甘示弱的民族性格有其天然的联系。

一个民族只有懂得自己的光辉历史，才能焕发全民族的无限激情和自豪感，才能继承和弘扬民族的优良性格、优秀文化，才能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里，振奋精神，施展聪明才智，用他们创造性的劳动和卓有成效的社会活动，谱写出崭新的历史篇章，从而将社会不断地推向前进。

任何一个先进民族不可能不懂得自己的历史。每一个蒙古尔人不仅应当懂得自己的祖先们是怎样前仆后继、披荆斩棘走过来的，更应当懂得现今的蒙古尔人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该如何继

承和弘扬自己的优秀文化，发挥自己的智慧才干，加速本民族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不断提高民族素质，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繁荣，进而跻身先进民族行列。

可是，使我们万分遗憾的是蒙古尔人还没有一部历史。蒙古尔人的历史渊源问题仍处在讨论之中。就诸多问题的讨论情况看，一些问题尚未触及，一些问题若明若暗，另一些问题的研究则十分明显地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往往不能自圆其说。因之，时至今日，蒙古尔人仍在期望着一部蒙古尔史书问世。

无可讳言，没有历史记载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不懂历史，继承和弘扬从何谈起？

平心静气地说，土族的历史从来没有人系统地研究过。新中国成立前，一些巡边游人曾遇到过蒙古尔人，亦作过一些报道，大都介绍他们当时的情况。关于他们的历史渊源，虽有一些讨论，但众说纷纭，且无论证，大有随心所欲之嫌。如有人认为土族为沙陀族遗，有人认为土族与党项或羌人有关，有人认为现今的土人土司多为蒙古人，且语言与蒙古语相同，故与蒙古有关，有人则以土人的“土”为依据，认为土人便是历史上活动于青海的鲜卑吐谷浑之后裔。以上无论持何种观点，都没有做进一步的论证，使后来的人莫衷一是。于是，凡论及这一问题时，不论族人，还是学者皆张口结舌，或曰“说不清”。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前土族史的研究状况。

1958年夏，国家组织了数千人参加的国内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队，陈永龄教授率由19人（本人也是成员之一）组成的土族社会历史调查队对甘、青土族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深入的研究，并编写了《土族简史简志合编》一书（内部铅印）。其后，由于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和十年动乱的缘故，土族史的研究完全中断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即1981年，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以1958年社会历史调查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为依据，编写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一书，上面提到的两本书中，对土族历史有下列叙述：“土族自称‘蒙古尔’（蒙古）或‘察罕蒙古尔’（白蒙古）。它反映了土族族源与蒙古族的密切关系。在互助县土族中，流传着祖先来自蒙古人，以及成吉思汗大将格日利特（格热台）率部留驻今互助县一带，以后与当地霍尔人通婚，逐渐繁衍而成土族的传说。互助县最大的喇嘛教寺院佑宁寺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建成时，格日利特被追封为‘尼达’（土主之意），寺中还立有他的铜像，过去土族把他当作本民族的祖先来崇拜。”史书记载证实，互助土族来源中“确有一部分是从明代安定卫迁来的蒙古人”。这就是从新中国成立起至1981年期间对土族历史来源的统一说法。

差不多与《中国少数民族》一书同时编写出版的《土族简史》中，在对土族历史来源未作任何论证的情况下换了一个说法，通篇以吐谷浑为主线，编者

按语云：“关于土族历史来源的种种问题，尚待今后深入研究。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笔者按——未见这方面有价值的资料），我们认为，土族源于吐谷浑之说，道理更多一些（笔者按——不曾听到，何谈多矣！），比较可信。”其后在一些文人的大作中常常照抄《土族简史》之说，抄来抄去抄出了新面貌，什么“关于土族历史来源的种种问题，尚待今后深入研究”的话也不再说了，直截了当地说土族就是吐谷浑的后裔。科学就是科学，它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为了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为了土族人民真正懂得自己的历史，笔者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于1993年出版了《土族（蒙古尔）源流考》。该书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好评，藏学专家说：“该书关于土族历史的论述与藏文文献之记载完全一致。”《土族（蒙古尔）源流考》荣获青海省第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那么，长期悬而未决的关于土族渊源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呢？就我个人几十年来调查土族、研究土族的情况而言，一些过去不太明朗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步明朗了起来，诸如与土族临近的藏族、蒙古族为什么称土族为达勒达（dolda）？这个问题过去还没有完全弄懂，最近在查阅史书中得到了满意的答案。又“霍尔”一称过去不甚了解，随着更多藏文文献汉译本的问世也得到了合理的解释。还有一些问题尚待深入研究，但从总体上讲，基本如此。

就史学而言，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门外汉，但一种责任感却驱使我涉足这个陌生的领域。

过去，有人撰文说土族没有神话，也没有史诗。对此，我一直抱有怀疑态度。因为小时候曾听过格赛尔的故事，尽管是些片段，但格赛尔的故事在土族群众中实实在在的存在着，格赛尔无人不知，阿卡其东无人不晓。在我出生的那个村子对面土山顶上有一块石头孤零零地坐落在那里，足有数吨重。土山上怎么会有这么一块石头呢？老人们津津有味地说：“过去，我们这里都是草地，格赛尔曾牧羊到过这里，那石头是格赛尔用他的抛儿甩上去的。”在大坂山（今互助泽林峡内）的山脚下，路旁有一块边长约10尺的大石板，石板中部是个大窝，石板的左右两边有对称的两个土包。老人们说：“格赛尔曾经到过这里，翻越大坂山后就坐在这块大石板上休息。中部凹下去的部分是格赛尔的屁股压下去的，两边的土堆是从两只靴子里倒出来的。”沿着十八盘路登上大坂山顶，见大坂垭豁南部有一坐北向南的石山，山梁上一道长长的沟，宛如切开的鱼背。老人们说：“格赛尔翻越大坂时，他的牧羊狗就是顺着那座山跑下去的，山梁上的那条沟是因为牧狗拖着索链留下的痕迹。”类似传说，各处可闻。

1957年，笔者与照那斯图同志、高宝珍同志再次赴互助土族自治县进行土族语的补充调查。调查期间，高宝珍同志继续在东沟大庄村搜集词汇，我与照那斯图前去纳仁郭勒的斯缅村和木拉霍尼其的贺尔郡，请来了土族格赛尔说唱艺人官布希加。他不愧是方圆闻名的民间艺人，我们从他那里记录了丰富的语

言资料。我们请他唱一唱格赛尔，他说，格赛尔的故事太长，需要说唱半年。听后使我们大吃一惊，原来土族还有那么大部头的史诗！后来，他身体不佳，我们也到期要回北京了。此后，一直到他去世，再也没能见到他，他同他的格赛尔故事一同离开了人世！想起来实在是后悔莫及！官布希加的去世对研究土族格赛尔无疑是个损失！

幸运的是，1984年，我突然收到当时在中央民族学院学习的李林财同志的信，并抄有百余行诗，是用拉丁字母并加一些特殊符号写成的，说是土族格赛尔史诗中的几行诗，要我试读，并说全文在那顺巴雅尔教授手中。我费了好大工夫才读完，大部分试读成功，觉得非常有趣。

那顺巴雅尔教授是我50年代就熟识的好友。为了能尽早读到《土族格赛尔》的全文，曾寄函那顺巴雅尔教授，提出两个方案：一，复印一份给我，所需费用由我负责；二，我去北京，共同翻译整理。那先生没有复函，听说他身体欠佳。后来，传来噩耗，那先生与世长辞！我为那先生的去世悲痛，也为未能得到土族民间文学中的瑰宝而深感惋惜！

1985年，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召开审稿会议。会议期间，我去拜访我的老师清格尔泰教授，言谈中我提起了那顺巴雅尔教授手中有《土族格赛尔》的事情。清格尔泰先生听了后说，那本书他也有，是一位外国学者赠送给他的，并拿出书要我拿去试读。当时，我觉得清格尔泰教授也只有一个，并且为朋友所送，我拿了太不近人情，故求清教授复印一份给我就行了。这年年底，我就收到了清格尔泰教授寄给我的复印件。

《土族格赛尔》是由德国人施劳德于20世纪40年代搜集于互助县威远镇东木拉霍尼其，演唱者是民间艺人官布希加（学名为王文玉）。后经瓦尔特·海西希整理，以德文出版。

拿到《土族格赛尔》复印本后，我如饥似渴，几天工夫就试读成功，一口气读完了全文。啊，太有意思了，不愧是一部杰作！遗憾的是故事还没有讲完，我坚信，这个没有讲完的故事，必有民间艺人续讲后事，使之成为一部优美而完整的作品！

民族之间互相交往，互相交流，互相吸收其生产技术、文化营养乃是普遍之现象。土族与藏族、蒙古族有着相似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又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因此，文化间的交流成为一种很自然的事情。《土族格赛尔》或许是藏文化影响下产生的，或许是蒙古文化影响下产生的，或者二者兼有之。但当它一产生就深深地扎根于土族传统文化的泥土之中，散发着土乡泥土的芳香，与藏族格萨尔和蒙古格斯尔迥异。

为了把这个史诗早日贡献给土族人民，本人日夜奋发整理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做了如下工作：一、首先译成土文；二、补充不完整的句子；三、因有些对话原文张冠李戴，经研究后，使其对号入座；四、上下衔接不严密的使之

自然衔接起来；五、有些需要调整的诗句作了适当的调整；六、作了必要的注释；七、土文译为汉文；八、请嘎玲和苏伦格作为第一读者通读了全文，又按二位的意见作了必要的修改。定稿后，得到了省古籍办和省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于1994年正式出版。我想，尽管水平不高，但总算实现了我的一个心愿。

我这多半生一直爬在研究土族的资料中，《土文方案》得到了肯定，土族文字得到了推广，发表有关研究土族问题的论文近40篇，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有《土汉词典》、《土族（蒙古尔）源流考》、《土族格赛尔》（译著）、《河湟蒙古尔人》，其中《土汉词典》、《土族（蒙古尔）源流考》、《河湟蒙古尔人》三部专著先后荣获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土族格赛尔》得到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文联、中国社科院四部委的表彰，并颁发了荣誉证书。我与他人合作的专著有：《蒙古语族语言词典》、《青海少数民族》、《土族简史》等。其中《土族简史》荣获五种丛书二等奖。本人虽做了些工作，但距党和人民的要求还很远很远。尽管如此，党和政府给了我很多荣誉，先后给了民族语文先进工作者、民族古籍先进工作者、青海省优秀科技人才等荣誉，享受政府津贴。我曾任中国民族语言研究会理事、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国土族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等社会职务，为省政协第五、第六届委员。

目 录

白鞑靼是土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蒙古尔(土族)是历史上不同时期来到河湟流域的蒙古人	(26)
土族李土司系沙陀晋王李克用后裔	(40)
赤古系白达勒达人	(55)
宁濮郡王驸马长吉系阿剌忽失后裔	(58)
格勒特即西平王奥鲁赤考	(65)
土族赵土司系蒙古雍古氏	(72)
“霍尔”杂谈	(78)
dolda(达勒达)辨析	(85)
民和三川地区土族来源之传说	(87)
土族姓氏初探	(91)
土族族称辨析	(96)
土族组成成分分析	(102)
青海土人部落的记载与考证	(106)
土族是蒙古人和蒙古化沙陀人的融合体	(117)
浅析东乡族和裕固族的民族名称	(141)
土族的姓与名	(145)
简论土族的渊源及形成	(156)
关于蒙古尔(土族)的形成	(166)
土族(蒙古尔)语言	(177)
土族语中 nge(ge)的用法	(189)
蒙古尔(土族)语和蒙古语	(199)
青海汉语中的某些阿尔泰语言成分	(212)
析青海汉语中的让动形式“给”	(219)
汉语青海话名词的特点	(228)
蒙古语族康杨回族语语音特点	(239)
清格尔泰与土族语言文字	(246)

土族文字方案 (254)

土族语言中的音变现象及其文字书写问题 (287)

关于制定《土文方案》和试行土族文字的一些问题 (296)

千年夙愿, 今日得偿 (304)

贯彻落实党的民族语文政策 为提高土族人民文化而奋斗 (313)

试行中的土族文字 (323)

白鞑靼是土族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关于土族（察罕蒙古尔）的族源问题，迄今尚无一个统一的说法，一说土族是以吐谷浑为主干形成，又一说是以蒙古为主干形成的。这两种说法各有长短，但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近来坚持以吐谷浑为主的同志发表了不少文章，其中关于土族为沙陀李克用后裔的记载和传说则似乎已被否定。因而土族的族源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从表面看来，主张吐谷浑为主和主张蒙古为主二者之间似乎存在某种重大分歧，实质上并无原则分歧，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今日的土族是由鲜卑吐谷浑人和元代蒙古人结合，并吸收少量其他民族成分而形成的。他们的分歧点只不过是谁主谁次罢了。至于吐谷浑人先于蒙古人来到河湟流域的问题，他们却从来没有分歧，也不可能有什么分歧，因为历史明确地记载着吐谷浑上陇是在4世纪初，而蒙古人攻下积石州是在1227年。本人所关心的绝不是吐谷浑人和蒙古人谁主谁次，谁先谁后的问题，而是吐谷浑人和蒙古人结合而成的论点是否符合历史实际？是否为我们拨开了蒙在土族族源问题上的迷雾？以我看来，这个迷雾尚未拨开，解决这个问题的路程，还相当遥远。毫无疑问，要做到对土族族源有一个比较全面，比较合乎历史实际的解释，恐怕还要由专家们花费相当大的气力，付出艰苦的劳动。

前面已经提到，在研讨土族族源问题上，将关于沙陀李克用后裔的种种记载和民间传说一概加以否定、并把它置于一旁，这无疑是一种草率的举动。事情的真相大概恰好相反，抛开沙陀李克用及李克用借以起家的阴山鞑靼去谈论土族族源，这很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误会。本文正是要从阴山鞑靼（白鞑靼）入手解释土族的族源。

笔者虽不是从事历史研究工作的，但作为土族的一员，却十分关心专家、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因之，大着胆子谈谈个人的意见，不对之处，请指正。

^① 土族历史研究中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今后需要进行专题研究，不断修正，从而达到整体上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一、吐谷浑绝非土族先民

本文的主旨是论证历史上的阴山白鞑靼和今日察罕蒙古尔（土族）的渊源关系。^① 为了便于叙述，首先指出吐谷浑说中的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个推断多于史实的论点已经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吐谷浑上面去了。我们应当从吐谷浑说中解脱出来，从更广泛的范围中去探索土族的族源问题。

纯和杂是相对的，世界上绝没有纯而又纯的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民族也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我们说“吐谷浑绝非土族先民”，并不排除土族中含有吐谷浑成分，但说吐谷浑是组成今日土族的主干部分，则是难于确认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可用以下各点来说明。

第一，吐谷浑本为4世纪初辽东鲜卑慕容廆的庶兄，因兄弟不睦，吐谷浑率领族帐七百（一说为一千七百）户西附阴山，后假道上陇，到枹罕（今甘肃临夏）自为君长。吐谷浑死后，他的子孙们与羌酋联合，共同建立国家，以鲜卑族长之名为国号，称吐谷浑国。其国历经三百五十年，到了663年，由于吐蕃禄东赞率兵攻击，加之吐谷浑臣素和贵逃入吐蕃，陈述吐谷浑内部情形，吐蕃发兵大破吐谷浑，慕容诺曷钵及弘化公主弃国逃到凉州，其后于670年唐逻娑道行军大总管薛仁贵与吐蕃在大非川一战，败绩，吐谷浑全国尽没，自此吐谷浑故地均在吐蕃的控制之下，只有慕容诺曷钵率亲信数千帐内附，徙于灵州，后转云代。

那么吐谷浑国全国灭亡，残部东徙灵州，是不是意味着吐谷浑故地一扫而光，只留下了人走炊绝的真空地带了呢？对此主张吐谷浑为土族先民的同志有大量考证，证明吐谷浑曾经活动过的地域里仍能找到他们的足迹。指出南边“雪山”有吐谷浑人居住。一个严重的误解就发生在这里，把南边“雪山”的吐谷浑人误认为今日土族的先民。应当指出，历史上的吐谷浑人绝不是现在我们有些同志脑海里形成的那种如同土族那般模型的吐谷浑。十分明显，吐谷浑上陇建立吐谷浑国家，其族帐只有七百户之众，就是拿最大的数字一千七百户计算，那也在东西三千里，南北一千里的广阔的地域里应该说是寥寥无几。“少数慕容部贵族与众多羌族部落酋长融合成为一个统治阶级，鲜卑人羌化了，因之，吐谷浑实际是羌族的国家。”羌族和鲜卑吐谷浑人在青海建立起来的吐谷浑大国，是以羌族为主，因而历经三个半世纪，吐谷浑的民族特征发生了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失掉了许多自己固有的特点，少数吐谷浑人被众多的羌人所同化。吐谷浑亡国后，又长期在吐蕃的占领下（即留居故地的吐谷浑残部），吐谷浑羌化的过程随之加深加快，后来融入吐蕃中去了，这才是合情合理的，符合历史实际的。其次，众所共知，人数很少的鲜卑吐谷浑人能够在众多的羌人中间（后来在吐蕃当中）生息近一千七百年之久，并且不受羌到吐

^① 这绝不是说土族就是阴山白鞑靼，而是说阴山白鞑靼是土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蕃的强烈影响，在语言、服饰、习俗诸方面如此完整地保留了与羌和吐蕃截然不同的特点，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这里顺便提一下坚持吐谷浑为土族先民的同志们对土族语言的某些脱离实际的解释。他们为了证明自己论点的正确性，提出土族语言之所以近似蒙古语，那是因为从蒙古人那里学来的。这种论点的不正确性就在于要把我们拉入一个极为玄妙的世界中去认识问题，除非说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带着一种近似蒙古语的语言降临到藏、汉包围中的吐谷浑（或是土族——以吐谷浑说而言）孤岛，给他们教会这种特殊的语言外，我们就无法理解了。因为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决定土族从来是和毗邻的汉、藏族人民密切往来，绝没有超越这个范围跑到遥远的蒙古大草原上去学习他们的语言的必要。对土族语言还有一种解释，即认为土族语言是受蒙古语的影响而形成的。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要知道，一种语言的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具有极大的稳固性，任何一种影响都不能彻底摧毁它而建立某种新的体系。历史上只有转用他族语言的事而无由于受影响而改造语言的事情。试想，如果一种语言拿自己的影响可以把另一种语言改造成和自己一样的语言，那么，自吐谷浑上陇到元代蒙古人攻下积石州的九百年间，吐谷浑语早被羌语（或吐蕃语）所改造。所谓吐谷浑羌化，就是吐谷浑转用羌语而融入羌族中去了。毫无疑问，今日土族人民进行社会交际的工具——现代土族语言就是他们的祖先们曾经借以交流思想，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协调其共同活动，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得到了新的发展的语言，是土族人民世代使用着的母语，对此不容有任何的怀疑。

那么，南边“雪山”的吐谷浑人究竟指何人而言？只要认真考察一下河湟流域的不同的藏族部落，也许会找到一些极为有益的线索。因为我们不能否认吐谷浑先是羌化，后融入吐蕃的这一历史事实。

第二，坚持吐谷浑为土族先民的同志在“吐浑”，“退浑”，“土人”，“土族”这些词上耗费了不少笔墨，似乎找到了今日的土族为鲜卑吐谷浑后裔的铁的证据。为了叫人们相信这一点，他们有以下说明，即蒙古语中的“浑”是人的意思，所以“吐浑”在元时被称作“吐人”，“土人”了。李土司南哥被称作“西宁土人”实乃“吐人”或吐谷浑人。这种解释不是主观的推断就是人为的黏合，同样是无稽之谈。其理由有六：

（1）吐谷浑本为鲜卑徒河涉归庶长子之名，“浑”本无“人”的意思，正如我们不能把张军理解为张家军队一样。至于历史上“吐浑”，“退浑”之称，则是“盖语急而然”，更无“吐人”或“土人”之意。

（2）现代蒙古语里，“人”呼为“hun”，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如内蒙古自治区的大多数蒙古人呼“人”为“hun”。但是，在蒙古语的其他方言里却不全然如此。应当指出，现代蒙古语的hun，是经过多少个世纪的发展变化才形成的。在此，蒙古方言间的差异对我们研究土族族源并不重要。然而，无论如何拿20世纪80年代的蒙古语hun（人）去证明4世纪鲜卑人吐谷浑的“浑”是“人”的意思，这显然是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为了明其真相，以免在这个词上徘徊不前，对此很有

必要加以澄清。人所共知，“人”这个词在现代蒙古语中呼为 *hun*（如同“浑”音），但是在古代蒙古语绝不是读“浑”（*hun*），而是读“古温”（*gu'un*）或“苦文”（*ku'un*）。对于这一点，可以从如下史料中得到证实。《蒙古秘史》称“古温”（*gu'un*），《华夷译语》称“古温”（*gu'un*），《登坛必究》称“苦文”（*ku'un*），《武备志》称“苦文”（*ku'un*），《武备志续》称“苦温”（*ku'un*），而在蒙古书面语中是“苦孟”（*kumun*）。这就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在元代蒙古语中称呼人的名词只有“古温”、“苦文”或“苦孟”，而没有“浑”。因此，元人把“吐浑”、“退浑”的“浑”当做“人”的意思，而把它改称“吐人”、“土人”是没有道理的。可见，推断往往给人一种假象，实不足证明吐谷浑为土族的先民。

（3）假定古代蒙古语中，或中世纪蒙古语中有“浑”（*hun*）这个词，而且假定元代蒙古人就是呼“人”为“浑”（*hun*）（我们已经说过这是不能成立的），所以把“吐浑”、“退浑”称作“吐人”、“土人”，那么明、清时代的蒙古人竟何其健忘，竟不知“吐人”、“土人”为“吐浑”、“退浑”？现代蒙古人又何其忤逆，竟不沿用他们的祖先对土族传统称呼，却一反常态叫起“察罕蒙古尔”（*qagan mongol*）、“达尔达”（*doldo*）来了，岂不怪哉！再说从羌人算起，所谓的“吐浑”、“退浑”、“吐人”、“土人”同吐蕃（藏族）相处近 17 个世纪，却不知“吐浑”、“退浑”为“吐人”、“土人”而称作“霍尔”（*hor*）或“朵朵”（*dodo*，为鞑靼之变音）。这就使人更加难解了。

（4）坚持吐谷浑为土族先民的同志们为使人们相信他们的论点，进一步地推论说，“霍尔”就是“吐谷浑”或“吐浑”、“退浑”，而“吐浑”、“退浑”就是“吐人”、“土人”，“土人”则是今日的土族。这个推断有多大程度的准确性，无妨也略加分析。“霍尔”由“胡儿”得名，这是大多数人的看法。藏文史书中的“霍尔”并非专指某个特定的民族，而是泛指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这里十分有趣的是根据藏学家们的考证，在藏文文献中对吐谷浑倒有特定的名称，叫做“阿夏”。这与《魏书·吐谷浑》向我们透露的把吐谷浑“西北诸种谓之阿柴虏”的消息是完全吻合的。《周书·吐谷浑》亦称“阿柴虏吐谷浑”。由此可见，藏文史书中的“霍尔”和“阿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不容混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一提，如果藏文史书中的“霍尔”以及当今的藏族所称的“霍尔”素来是指“吐浑”，“退浑”，“吐人”，“土人”的，那么藏文史书中称成吉思汗为 *horg yi rgyal-po*（霍尔的皇帝），岂不成了吐谷浑的皇帝了吗？岂不成了历史的笑话！可见，“霍尔”就是“吐谷浑”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5）土族为什么自称“蒙古尔”·（*mongol*），“察罕蒙古尔”（*qagan mongol*）呢？坚持吐谷浑为土族先民的同志援引《新元史》中的“其本非蒙古而归于蒙古者，为白达达”作释，言外之意就是吐谷浑本非蒙古，后归于蒙古，故有“白达达”（察罕蒙古尔）之称。可是在元朝蒙古大帝国里“本非蒙古而归于蒙古者”何止吐谷浑一家！显然援引这段话的同志忘记了这个必须首先予以考虑的问题。其次，“白达达”一词并非出自元代，在 10—12 世纪塔塔儿（鞑靼）联盟时期它已经客观